

與張光直先生談夏文化考古★

李永迪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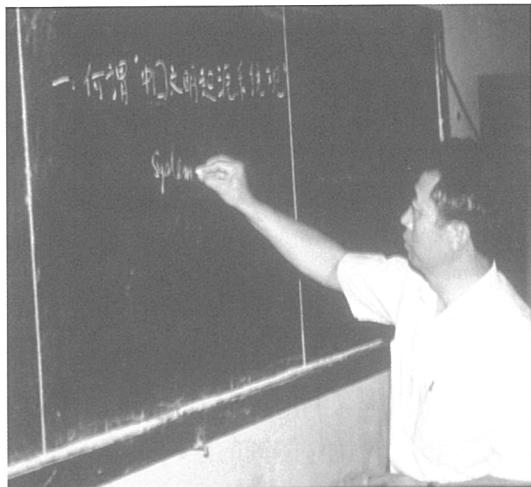
李永迪（以下簡稱李）：夏文化考古是大陸考古學界裡一個討論很久的課題。張先生在第四版的《古代中國考古》(*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1986)裡，用了相當篇幅敘述了當時國內夏文化考古的緣起與研究成果；書裡也提到張先生自己對夏文化考古的看法。您在中國考古這個領域裡做了很大的貢獻，也有您許多獨到的見解。這次的訪談想請張先生基於您在美國多年的中國考古研究工作，談談您個人對夏文化這個課題的一些想法，包括您對夏文化考古的接觸，這個課題對您在學術研究上的影響等等。也想請您談談歐美學界對夏文化考古的看法，以與國內的研究角度作個比較。

能不能先請您談談您是如何開始接觸有關夏文化的課題。

張光直教授（以下簡稱張）：我想你是知道的，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商代，我自己並沒有專門從事夏代或夏文化的研究。有關夏代的具體工作與成果，國內的許多專家學者都比我知道的要多。我只能就自己涉獵所及，簡單說說我的看法。

我記得最早接觸到夏這個觀念是在北京讀小學的時候。那時提到中國古代歷史，自然是從夏代開始。不過真正具體接觸到有關夏的討論，還是得等到在台灣上了大學以後。

當時關於中國上古時代的課有兩門。一門是中國考古學，由高曉梅（去尋）先生主講，完全是考古。另一門是中國古代史，由李玄伯（宗侗）先生講授。他的課則完



「何謂中國文明起源系統觀？」
張光直先生在吉林大學上課留影

★ 1999年冬，河南大象出版社邀光直師筆談夏文化考古，以先生書寫不便，改採訪談方式。豈料先生未能親見文集付梓，於今年年初在波士頓病逝。因追念光直師一生奉獻學術，經大象出版社同意，得將原文在台重行刊登。謹此致謝。原文見《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河南：大象出版社，2001）。

全以文獻為主。在我念大學的時候當然還談不上有夏代考古，所以有關夏的討論，主要還是在李玄伯先生的課上。李先生主要依據《史記·夏本紀》，以及其他相關的史書記載。

李：李濟之先生當時對夏的問題是不是也有過闡述？安陽這樣劃時代的發現，證實了商代的存在，也多少證明了傳統史籍中有關上古史的記載是可以相信的。他在安陽的工作是不是讓他肯定了夏的存在？

張：當時學界裡多半是肯定夏代的存在的。安陽的發掘讓學者們體會到史書裡的夏代恐怕也是有根據。不過史語所到了台灣以後，這群安陽的工作者裡並沒有人專門從事夏代的研究，因為當時沒有新的材料。所以李濟之先生在課堂上也並沒有具體談到夏代的問題。他的觀念是如果沒有考古材料，他便不提。安陽小屯以前的古史他是不討論的。他當時教課的範圍與李玄伯先生是分得很清楚。考古他教，古史李玄伯先生教。

李：現在商以前的考古材料已經累積的很多了。您是李濟之先生的學生，您覺得從李濟之先生做學問的態度來看，假如他看到這些材料，以及大陸學界對夏文化考古的討論，他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132 張：這自然不好說了。李先生到了台灣以後不大討論大陸考古學者的工作，尤其是新的田野工作。他總是持比較保留的態度。當時他比較願意接受的考古學者有幾個，一個是梁思永先生，一個是劉耀，也就是尹達。後來大陸有很多新的田野工作，但是李先生都不大提起。不過現在新材料的累積相當豐富。我相信李先生如果在世是會很重視的。

李濟之先生雖然對夏代沒有提出什麼看法，但他對傳統史籍裏有關古史地望的記載是很留意的。有些他採信，也有些他從學理上去駁斥。

李：那麼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運動，在當時的台灣學術圈裡，是否還起著一定的作用？還是由於史語所在安陽的工作，以及台灣的政治氣氛，使顧頡剛疑古運動的影響沒有能持續下來。我記得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初，《古史辨》在台灣仍然是位於禁書之列，只能在流動的地攤上看到。

張：古史辨運動在台灣並沒有持續下去，因為當時繼續從文獻做古史的人很少，

只有傅斯年先生、董作賓先生、李玄伯先生、屈翼鵬（萬里）先生等。傅先生當時到了台灣以後，做了台灣大學校長，沒有什麼時間教書，這是很可惜的。到我做學生的時候，課堂上比較少提及顧頡剛對古史的批評。《古史辨》的影響很大，我們多少會涉及。但是顧頡剛對夏代的具體討論，比如說夏禹是條大蟲，反而是我自己讀文章的時候才接觸到的。

我上小學的時候便讀了《古史辨》。那時我睡在我父親的書房裏，書架上有一套《古史辨》，我便拿來翻閱。當時覺得很有意思，把整套《古史辨》幾乎都看完了。這樣《古史辨》對我也起了很大的影響。現在我總是不信古書，對古史總是先持懷疑的態度。這樣的態度不一定是對的；只能說是我受了古史辨運動的影響。當然有幾部史書我是非常相信的。比方說《史記》、《左傳》。我想古史辨運動在現代的意義是對於古史、古書我們不能照單全收，必須加以爬梳。當然《古史辨》裏的很多說法，在現在看來也還值得再商榷。

從某個層面來說，傅斯年的「新史學運動」是接續了《古史辨》的傳統。打破古史以後便必須得重建。所以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時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口號。^①傅斯年這句話也是針對用唯物史觀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方向。他特別強調材料的重要性。但他對如何研究材料，以及材料裏有什麼樣的規律並沒有提出說法。

李：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在歐美是不是比較受到重視？1999年剛出版的《劍橋中國上古史》的序言裏，^②提到顧頡剛對夏代的質疑很受到同時期某些西方學者的回應。序言的作者M. Lowe及夏含夷（E. Shaughnessy）對於中國古史則持比較中肯的態度，認為過去西方學界裏對中國傳統古史的批評，也失於偏頗。不過我們如果從Creel一九三〇年代對夏代的討論開始看，到現在華盛頓大學的杜樸（R. Thorp），Dartmouth College的艾蘭（Sarah Allan），普林斯頓大學的貝格立（Robert W. Bagley）教授等，美國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的學者始終對夏代的存在持保留的態度，認為有待進一步證明。即使是新出版的《劍橋中國上古史》，其中也並沒有單獨的篇章討論夏代。這和中國學術界裏對夏文化的熱烈討論，有很明顯的差別。您是在美國拿的博士學位，也在美國從事了多年中國上古史的教學與研究。能不能請您就這個現象，談談美國關於夏代，夏文化的研究。

^①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
^②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s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張：六〇年代以前，觸及到夏代的美國漢學研究恐怕都受了顧頡剛疑古運動的影響。但是由於沒有新的材料，所以當我在哈佛大學唸書的時候，美國學者對夏代沒有很多的討論。一直到1959年發現二里頭以後，安陽以前的古史才又開始引起學界的注意。不過當時二里頭在中國是被當作商的。所以美國有關夏代的研究要等到七〇年代、中國考古界開始把二里頭定為夏以後，才又開始。即便如此，美國學者在夏代、夏文化課題上的研究還是有限。這跟他們對夏代的認定當然也有關係。

我想我們現在說二里頭是夏，是有些證據的。從年代，從地層，從史書上有關夏人活動範圍的記載，我們都可以看到二里頭文化與我們從古史裏認識到的夏是有相當的吻合。卜辭裏的工方、土方從地理位置上或許相當於二里頭文化的分布，但在地層和時間上是說不通的。如果我們要應用古史的材料，我們必須得說二里頭文化與夏代有很密切的關連。

西方學者對夏代問題的保留態度，主要是基於出土文字材料的缺乏。二里頭文化從考古證據上來看，還是屬於史前；也就是說它沒有文字。西方學者不願意認定二里頭是夏代有他們的考慮，而這樣的考慮也是出於做學問的謹慎態度。這是可取的，我們不需要去批評。從學術研究的立場來講，在材料還不完備的時候，不同的說法是可以同時存在的，我們不需要去排斥異說或判定誰是誰非。當然假如哪一天二里頭真的找到了文字，二里頭是不是夏的問題也不一定能解決。商代的政治體系是以商王為中心的，所以卜辭裡面盡是關於商王的記載，而商王世系也得以保留下來。至於夏代是不是如此，它有沒有一套類似商人的祭祀先王先公的禮儀，甚至有沒有有關先王先公的文字記錄，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但是不管怎麼說，二里頭是不是夏，將來有了新的考古材料以後，必定能夠有所定奪。我們現在不需要刻意地對這個問題下個定論。

李：您當然相當早便將二里頭與夏代聯繫起來，並且認為二里頭四期都應當是夏而不是商。您當時的依據是什麼？

張：我在七〇年代收入《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的那篇文章裏，^③便主張二里頭四期全都是夏代。我認為我們所謂從夏到商的變化，應該是個政治上的變化，也就是朝代更替的變化。朝代更替代表的是社會上層統治階級的改變。這樣的變化在物質文化上應該反應在與統治階級有關的物質遺留，比方說大型的宮殿基址、城牆，以及各種禮器，包括青銅器、玉器等。陶器在考古學中固然很重要，但它屬於日常生活

^③〈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個關鍵問題〉，《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76），151-169頁；後收入《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出版社，1983），57-80頁。

活用品，與統治階級較遠，不見得會很明顯地反應出朝代的更替。我當時是基於宮殿基址、青銅禮器、玉器的特徵，才認為二里頭反應的考古學文化應當是不同於商的；也就是說它應該是夏。這和我現在對早商的探討是同一個思路：我們必須從上層統治階層的物質文化裡來找商王朝早期的考古遺留。

李：國內考古界對您在商丘找早商的計畫一般都持比較懷疑的態度。您是否能說明商丘計畫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而提出的。

張：正如我方才所說的，我們若要尋找商王朝的早期遺留，乃至於商王朝的源流，我們似乎應當從統治階層，也就是貴族的物質文化上著手。我特別看重的線索因此包括商代的青銅器禮器，墓葬習俗，乃至於宗教信仰等。

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與東海岸良渚文化的關係我們到現在還不是很了解。但兩者之間似乎有一定程度的聯繫。而我們從墓葬上看到的階級分化，似乎也可看出商代與東海岸新石器文化的關係。如果從這些與上層階級有關的物質文化來看商人的發展，我們或許可以說商人集團大約與浙江北部的考古學文化有某種關係。而後它逐漸往北遷移，到了山東的南部，然後再往西轉，進入河南。

我這裡是用集團的概念來理解三代的政治型態。商人集團應當是個有武裝力量的群體。他們可以做某種程度的遷徙，可以是流動的。數個這樣的集團便可以組成一個邦，或國。所謂萬邦林立的時代恐怕都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的。夏代是如此，周人的崛起也是如此。

我剛開始跟社科院考古所談合作項目時是徐蘋芳先生任所長。徐先生很表歡迎，並希望我選一個合作工作的地點。我對徐先生說我想做個最難的題目，於是便提了在豫東找先商的計劃。當時徐先生提到的可能合作地點包括二里頭，但我的想法是要從頭開始做起，而且要做就做一個難度最高的項目。徐先生很支持我的想法，不過也表示這個題目是相當困難。

我設想的早商都城應當是有城牆的，城裡有也應當有某種夯土建築、高臺。當然也應當有統治貴族階級使用的青銅器、玉器。商做為一個朝代，一個有武力、甚至於好戰的政治實體，應當有許多能表現出它規模與力量的層面。比方說卜辭裏提到商王用羌做人牲，最多一次用了三千人。這反應了相當的政治、軍事力量。鄒衡先生的先商起於豫北說是基於陶器的研究。我同意鄒先生所提的幾個以陶器為主的考古學文化可能是商文化的一部份源頭。但這些考古學文化只會是整個商文化的一部份，甚至可能只代表商王朝中屬於平民的階層，而屬於統治貴族的階層不一定會在陶器上反應出

來。另外我們在豫北的考古學文化裏也還沒有找到能表現出商貴族集團勢力與規模，乃至於軍事力量的考古材料。所以我覺得必須到別的地方、別的遺址找。《史記》，尤其是《左傳》，還是有些比較可靠的歷史材料。《史記》裏提到商丘，《左傳》裏也提到商的先人與參星，也就是火星的關係。我曾讀到龐樸先生的一篇文章，〈火曆鉤沈〉，^④裡面提到管火星的官，也就是閼伯，與祭祀這個官的廟。火星即是西方天蠍星座Scorpion裏的一顆星，而現在河南商丘還有個閼伯台，又名火神台。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線索是董作賓先生根據甲骨文所復原的商人向東征人方的路線。根據董先生的研究，大邑商可能是在安陽以東、約有十二天距離的地方。這些是我為什麼會到豫東找商代早期都城的原因。

在這裡我必須強調的是歷史、考古，乃至於地質、動植物方面的訊息，都是我們做中國上古史時的基本材料。傳統史籍的材料可以是我們做學問的起點，但它不應當是我們做學問唯一的依據。當歷史材料跟考古材料衝突時，我們自然必須以考古材料為主。

這幾年社科院考古所與哈佛大學合作，透過鑽探、地質、遙感、考古的手段在豫東找到了一些我們認為與早商，乃至於先商有關的線索。我們在現今商丘縣城的附近找到了一個很大的東周城址，在柘城縣發掘了山台寺龍山遺址，並找到了一個殉牛坑。商丘縣的城址很可能是宋國的都城，而宋國的始封者正是殷的遺民微子。考古所的張長壽與高天麟兩位先生，推測城牆最早的年代可以到商末周初，而最近在商丘鹿邑發現的商末周初銅器墓也加強了我們對城牆始建年代的判斷。山台寺的殉牛坑更讓我們聯想到商先公王亥服牛的傳說。我們不能不說，從這些發現來看，豫東跟早商以及先商應當有某種連繫。

李：您一向主張商人是從東方進入中原的。這樣的說法是不是受到了中研院（傅斯年）〈夷夏東西說〉以來學術傳統的影響？近年來大陸學者似乎很強調商人屬於東夷的說法已經被現有的考古材料否定了。鄒衡先生當然是這個說法的主要倡導人。

張：我到豫東找先商倒不是基於〈夷夏東西說〉的考慮。我主要還是根據《左傳》、《史記》的記載。《左傳》、《史記》裡提到與商人先公先王有關的地點是可以在豫東找到的。有關論述可以參見我的〈商名試釋〉。^⑤

商人起源於東方的說法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有相當的傳統。「九一八

④ 〈火曆鉤沈〉，《中國文化》1(1989): 3-23。

⑤ 〈商名試釋〉，《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109-112頁。

事變」以後出版的《東北史綱》強調商人是在東北，山東一帶崛起的。當時參與寫作的傅斯年、羅常培、陳寅恪等三位先生，後來承認這樣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有民族情緒在裏邊的。

論證商人起源於東北還是有它的立論基礎；當然這不表示沒有別的解釋。當時主要用的是文獻材料。「九一八事變」以後，國人對東北益形重視，只要是有關東北的研究，都引起相當的關切。知識份子對學術界裏這樣的民族情緒也還是持理解的態度，並未很亟於批評。當然從學術立場來看，民族情緒是必須加以澄清的。不過即使在今天，《東北史綱》所反映的角度也還是可以諒解。近代中國所經歷的動亂在每個中國人身上都烙下了無法磨滅的痕跡。

講到民族情感的問題，我想這點是中國人與外國人在做中國考古時所有的一個明顯的不同點。中國人做中國考古自然地會有一種文化與歷史的使命感，會有一種對自己文化，自己歷史的情感在裡面。比方說，假如今天我在商丘找到了商代的都城，那種喜悅與高興，那種與自己文化歷史相銜接的感覺，不是一個從事三代考古的西方學者所能體會的。

李：我想國內很多考古學者都會同意您的看法。不過我體會到國內學者在面對西方學者對中國考古的討論時，常常會有某種程度的民族情緒反應。比方說當西方學者懷疑古史，古文獻的可靠性，或甚至懷疑夏代是否存在時，國內學者往往會認為西方學者不懂中國文化，或者認為西方學者否定中國的歷史。這些當然是個人的反應，而不是見諸文字的討論。如果我們只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我們能不能說西方學者的質疑，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有他的依據？

張：西方學者的批評還是有他們的依據。比如說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曾經寫文章談到中國考古的歷史傾向；他的看法是可以作為借鏡的。當然這不是說歷史文獻材料不能用。理想上我們應該要結合各種材料來探討中國上古史。這包括考古，包括歷史，也包括各種自然科學的分析手段。這不只是科技整合，而是比科技整合又高一個層次。在研究中國上古史時，我們應當是不分學科的。也就是說對三代的研究是沒有學科的。沒有歷史學，沒有考古學，只有中國上古史的研究。

這其實跟史前史的研究是一樣的。考古學家、動物學家、植物學家、地質學家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個問題，從不同的方向來重建，來研究同一個課題，也就是史前史。其中不同的只是手段。

李：那麼您覺得目前對於夏文化的研究最需要注意的是哪些問題？

張：我想關於夏文化，乃至於對三代的研究，最重要的是不要把三代考古看做夏商周文明的考古，不要把三代只看成是三個文明線性的連續發展。我覺得我們應該用「萬邦考古」這樣的觀念來理解三代考古。也就是說夏商周只是萬邦中的三個，而夏商周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集團，而集團與集團之間隨時會有變動。

李：「萬邦考古」的觀念是不是比較強調各個考古學文化的橫向關係，互動關係？現在國內有關先商，先周考古學文化等的討論，在某種程度上是溯源，單線線性發展的思考方式，比較強調考古學文化的縱向關係。用萬邦，政治集團這樣的概念來理解三代，似乎更能反映考古學文化的橫向聯繫與互動關係。

張：我想我們是可以用三國，乃至於五代十國的模式去理解夏商周。我們當然也必須注意考古學文化的相承關係，不過夏商周不應當是政治或文化上的孤島。這我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裡已經有所說明。^⑥舉個例子說，當我們提到「三國」、「五代十國」與「唐、宋、元、明、清」時，我們聯想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觀念。「三國」、「五代十國」強調的是在某一段時間裏，幾個政治實體之間的關係。其中有縱向的傳承，也有橫向的互動。而「唐、宋、元、明、清」則強調縱向的傳承，甚至某個時代中某個政治實體的壟斷與獨大。當然唐、宋、元、明、清這些朝代有他江山統一的局面，但我們依舊不能說它們和周鄰其他政治實體、族群沒有互動的關係。

那麼夏、商、周應當是個什麼樣的時代？我們現在對夏商周的理解仍然偏重於「唐、宋、元、明、清」式的思考模式。我認為即使到了周代，周王室對與他同時的其他政治實體仍不能做到完全統領的地步。若然，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採用「三國」、「五代十國」的模式來研究三代？我們是不是應該多注意政治實體間橫向互動的關係，即使這些政治實體並不一定留下了任何文字紀錄？我認為透過這樣的角度我們應當能更進一步瞭解中國上古時代政治社會文化發展。

^⑥〈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係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78），287-306頁；後收入《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出版社，1983），27-56頁。